

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研究评述

李 德, 覃 琮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对现代性解构和否定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法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主流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转向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希克苏斯、伊里格芮和克里斯蒂娃。对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将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希克苏斯;伊里格芮;克里斯蒂娃

[中图分类号] C91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6)05-0097-(05)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跟社会学的产生一样,是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产物,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中,并在二战以后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1]

一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传统女性主义主要包括三大理论流派,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传统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即女性主义在二战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整体上发生的“后现代转向”,其目的是超越传统女性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推动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以其独特的“性别视角”成为现当代西方思想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有力地推进了西方女性解放的进程,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2]

传统女性主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受压迫状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分析,目标都是争取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合法权利,实现男女平等,故它们的理论重点都在论证女性在知识、能力、理性、德性和天赋等方面并不比男人差,没有理由被

排斥在权力系统之外。后现代女性主义关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而是转向对西方整个学术传统和知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试图建立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模式和学术传统,形成女性性话语和女性语言。^[3]概而言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也不再是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而是文化问题(尤其是同身体有关的文化问题)。在这一理论转向过程中,法国女性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正是法国女性主义源源不断的理论贡献,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很快成为女性主义运动和后现代思潮中炙手可热的“显学”,也使得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法国女性主义”。^[4](为了行文不引起歧义,本文使用“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一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如此显赫,但英美的女性主义却似乎更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对它们的研究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对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本文尝试以述评的方式介绍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三大家——号称“圣三位一体”的希克苏斯(Helene Cixous, 1937-)、伊里格芮(Luce Irigaray, 1930-)、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的有关理论,藉此让读者更多了解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精髓。

[收稿日期] 2005-12-12

[作者简介] 李德(1977-),男,河南平舆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一、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思想渊源

(一)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之间一直颇有渊源。女性对精神分析的迷恋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有关女性在父权文化中地位的解釋,女性主义者就积极地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洞见来了解女性在文化中的构成,理解父权的统治:一方面依赖于精神分析学对女性的社会功能和性的功能所下的定义;另一方面对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和假设(比如,女性的“阉割情结”和被动性)进行挑战,尤其是精神分析学不言自明的男性视角。

对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而言,情形同样如此。在拉康的理论中,拉康强调阉割情结对男孩主体生成的作用,把男根(phallus)定义为最权威的能指,强调父名(name-of-father)在整个象征系统中的作用,忽略儿童在前俄狄浦斯阶段(pre-Oedipal)中对母亲的想象作用。这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精英主义论调自然受到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不过,拉康用他的镜像理论质疑笛卡尔所认为的人类主体生而存在的观点,把人定义为“讲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从而取代了笛卡尔的“思考的主体”(thinking subject)(笛卡尔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以及对性的讨论使他认为父权制度下的主体只有正视“阉割情结”和“性的差异”才能获得一个可以讲话的社会地位的这三个主要的思想领域都是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兴趣所在和关注点。^[5]而他对于理性主体的解构,对那种认为讲话主体对自己所说的话有着充分理解的假设的颠覆,对“性是天生”的说的质疑,都得到了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认同,也在帮助她们摆脱形而上学意义上对主体性定义的桎梏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致力于研究分析男女主体生成的不同,重点关注弗洛伊德和拉康很少涉及的母婴关系(mother-child)尤其是母女关系(mother-daughter),把这些当作超越和推翻父权价值观念的切入点和出发点。她们强调里比多驱力(libido drive)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强调前俄狄浦斯阶段(pre-Oedipal)遭受压抑却恒久存在的古老力量。

当然,对希克苏斯、伊里格芮和克里丝蒂娃而言,她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希克苏斯试图通过“女性写作”来展现另外一种女性秩序的景象;她相信女性身体的节奏和情感为推翻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主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伊里格芮则试图通过把性别的特殊性问题渗透到精神分析学最核心的假设和命题中来破解男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她致力于重新演绎拉康的理论,倡导所

谓的“女性女性”——即由女人自己来规定的女性,以此来探寻把女性身体作为知识产生之地的可能性。^[6]而克里丝蒂娃则是通过她的表意过程中的“符号分析学”(semianalysis)作为她的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来解释和说明她的“女性伦理”。这也使她与前面两位女性主义者大不相同,并由此招致一些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批评。^[7]¹⁶⁻¹⁷

(二) 法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目前在国内外理论界没有定论,但一般说来,人们大都承认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它是在反叛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它否认传统的二元思维模式,否认人的认识有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承认本质、规律、真理之类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要求人们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论争;二是它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语言转向,主张语言不单是思想的工具,还是思想本身或世界本身,否定传统思维方式对客观性、实在性、统一性和神圣性的追求,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倡相互理解和宽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兼有解构和建设两重意义。对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来说,本土思想家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三人的思想对她们影响最大。

福柯由于把一切都变成话语(discourse),把知识当作各种权力话语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将西方文明传统中那些看似自然、普通、合乎理性的原则、标准、程序以及惯用的方法等,全都看作是由某些特定权力所组成和为某些特定利益服务的,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完全将“人”看成各种文本的集合,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最终所指的单纯能指符号的位移和置换,从而消解了西方近代自笛卡尔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理性本质、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概念,瓦解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利奥塔则强调,科学和文学等都不过是按照一定“游戏规则”进行的话语活动,这些活动在20世纪以前都是在某个“宏大叙述”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述”而营构的一套自圆其说的元叙述。在后现代状态中,所谓合法的“宏大话语”,已经变得不再令人信服,从而出现了“元叙述危机”;这就使得人们的话语活动以及由话语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科学和艺术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动摇。德里达则断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的现实存在。他把西方自柏拉图以来至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并由此认为,事

实上“逻各斯”作为这个传统的中心并不是在其系统或结构之内,而是置身于其系统或结构之外的中心;于是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就被变成“无中心的”或“非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系统或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及主次关系都受到了颠覆。^{[7]16-17}

二、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代表理论

(一) 希克苏斯的“女性写作”

希克苏斯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似乎注定她同语言有不解之缘,而她的语言能力也是公认的。对她来说,语言似乎是惟一可以把握住的存在,而其他东西是稍纵即逝或游移不定的。然而,她又很快发现,即便在“写作的世界中,男人占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而女人的命运尚属未定之列。女人……会感到自己是没有被接受和不能被接受的”。那么,女人——特别是那些在现实世界流离失所而在语言世界又备受冷落的女人的出路何在呢?希克苏斯的回答是:女性写作(feminine writing)。

希克苏斯相信确有一种女性语言存在,但受到了父权制的压制。她认为,在父权制下从男性写作中所产生的现存的社会性别秩序是一个以阳具(符号化的阳具)为中心的男性世界,进入这个符号界就意味着认同了“父亲的法则”或父权制。在这个符号界里,男人是说话的主体,女人则是语言领域中沉默的羔羊。那么,为什么符号界是一个以阳具为中心的男性世界而不是一个以“阴道”为中心的女性世界呢?希克苏斯的解释是父权制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是语言或符号的建构。即在父权制文化中,阳具中心论与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粗略地说,理性主义)是形影不离、休戚与共的,由此形成或构造着传统文化中种种二元对立,而这些对立又总是一方优越于另一方的,或者说其中的一方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如主动性与被动性、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父亲与母亲、逻各斯与情绪等,而所有的这些对立无不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相联系。因此,父权制既是理性的世界(逻各斯),也是男人的世界(阳具),它意味着男人对女人在灵魂上和肉体上的双重统治,还使女人产生了自卑和自恨的心理。用希克苏斯的话说就是“男人使女人恨女人并成为自己的敌人,使女人动员其巨大的力量来反对女人。”希克苏斯寄希望于通过“女性写作”来解构父权制文化,超越父权制文化。

希克苏斯呼吁更多女人从事女性写作。她认为,女性写作的对象无非是女人的身体,而女性写作的目的是回到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必须被听

见”——惟其如此,“无意识的巨大能量才能迸发出来”。女性写作将使女人超脱父权制下有罪的位置:它将使女人的性体验不再受限制,使女人自由地实现其女性存在,重新获得其本身的力量;它还将恢复女人所特有的优点、快乐和器官以及女人的一直被封存的巨大的身体世界,并从边缘或闺房中走出来;女性写作“为女人制造了反逻各斯的武器”,并使女人能够为自己的权利而“在所有的符号体系和政治过程中自由地选择或抉择”。总之,女性的身体写作能使女人突破逻各斯中心论或男性写作的局限而发明自己的语言,更多地发现身体就意味着更多的女性写作。

必须指出,希克苏斯不完全仅是从性快乐或性体验的角度来讨论女人的身体同女性写作之间关系的。她的更一般意图是重建“主体”概念。在希克苏斯看来,在父权制下,(男性)主体与(女性)“它在”^①的对立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意味着主体对它在的统治、压抑和排斥。与之相反,“女性写作”是一种“爱的姿态”,它所描述或倡导的(女性)主体与“他人”(它在,在这里不仅仅是男人)处于爱的关系中——这尤其表现在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上。

(二) 伊里格芮的解构女性和“女性女性”说

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伊里格芮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差异的问题,支持女人争取自身的权利,但伊里格芮却反对一味地要求男女平等。她曾对“女人想要与什么平等”这样的问题大惑不解,声称所谓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虽然煞费苦心,但实际上最终将一无是处。要求平等就意味着把两性都“中性化”了,其最终可能的实践结果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伊里格芮认为,对女人的剥削是以性差异为基础的,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能从性差异出发。伊里格芮所说的性差异是没有中心的性差异,她坚信,男女之间的性差异是不容抹杀的,是女人获得解放的关键所在,而她所说的女性是“女性女性(feminine feminine)”。

伊里格芮对传统精神分析学进行了解构。首先,她对父权制的起源和父权制下的女人之社会角色、尤其是“母亲”作了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的解释。依伊里格芮的解释,父权制的起源是以母亲的牺牲为前提的,而父权制的维系是以对母亲的压抑、压制和压迫为基础的。因此母亲、处女和妓女是父权制加诸女人的三种社会角色,又正是从这些角色中衍生出所谓的女性特征。在谈到母亲的社会角色时,伊里格芮特别强调指出,父权制对父权和阳具的强调又使人忘记了人对母体的最初依赖,忘记了母

亲是人的(主要)生育者。于是乎,女人或母亲被看作是为了男人而存在的阴道和子宫,她的不可或缺性是由男人规定的功能性存在的。其次,她对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作了重新解释。伊里格芮指出,弗洛伊德以男性器官的可视性为标准来衡量女性的性器官和性体验对女人来说是陌生的和强加的。女人有其独特的性器官和性快乐,女人的性体验远远超出了父权制文化的想象,这为精神分析学所忽视或曲解。最后,她批判了拉康的符号界理论。在拉康符号界理论中,女人是不存在于符号界中的,女人——包括女精神分析学家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其存在或性快乐。在这样的语言现实中女人只能是“缺失(the lack)”或“它在(the other)”。这当然不能为伊里格芮所接受。她顺着拉康的思路指出问题不在于女人及其性快乐是否存在,而在于父权制文化是以对女人的性体验之否定为基础的,它使人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和女人的身体。因此,女人必须发明语言,“以表达我们同母亲的身体、自己的身体之最古老和最当代的关系,并解释母亲、我们和女儿的身体之关系”。

伊里格芮倡导“女性女性”——即由女人自己规定的女性来说明男女之间的差异。而母女关系是伊里格芮据以规定女性特征的一个基本视角。她指出,母女关系在父权制文化中是未被符号化的,是被曲解、被压抑和被排斥的。伊里格芮曾悲哀地说道:“母女关系是黑暗的大陆中的黑暗的大陆。”对母女关系的确认不仅产生了女人的谱系及女人在其中的位置,还进而关系到女人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伊里格芮以女同性恋的起源为例,解构了弗洛伊德关于按男性标准(拥有阳具)来理解女同性恋者的理论,指出女同性恋者起源于女童对母亲的依赖、起源于母女关系。伊里格芮还将女同性恋者从母女关系延伸到更一般的女人之间的性爱关系中。不过我们需要指出,这决不意味着伊里格芮排斥异性恋或仅支持同性,对伊里格芮来说,重要的不是让所有的女人都变成同性恋,而是让所有的女人最终都能在不受父权制束缚的情况下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性身份和性关系。伊里格芮进而把女人的性身份同女人的生理结构相联系,她还谈到了与女性身体有关的新技术有可能改变女人的生活。

(三) 克里丝蒂娃的符号分析学和“女性伦理”说

克里丝蒂娃虽然也坚决拒斥父权制,强调语言对女性解放的关键作用,但她无意创造一个女人所特有的女性世界——相反,她把女人或女性看作是

有待解构的。克里丝蒂娃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她的这一特殊立场招致了一些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也使她与前面谈到的希克苏斯和伊里格芮的思想有重要的分歧。

克里丝蒂娃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符号分析学(semanalysis)。这是对符号学或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综合的一种尝试。在她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都由于把个体与社会、身体与语言分割开来而未能说明人的前恋母情结时期是以何种形式来表达其身体的能量和冲动的,以及这种形式同后恋母情结时期的意义体系可能的关系。有鉴于此,克里丝蒂娃指出,符号分析学所强调的应不是结构、而是过程——用她自己的话,符号分析学的基本假定:“意义不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是一个表意过程(signifying process)”。具体说来,在语言或符号界中实际上有两种成分:一是索绪尔和拉康等人所说的(结构性)符号(the symbolic),二是与里比多相联系的(流动性)记号(the semiotic)——前者使符号界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后者使之处于动态中。符号分析学正是围绕着对记号和符号的关系之解释而展开的:记号是前语言的“语言”、前符号的“符号”;语言或符号界既依赖于记号(作为形式或模式的记号),又拒绝着记号(与里比多相联系的记号)。但克里丝蒂娃并没有把记号与符号对立起来或分割开来,恰是通过分析两者在前恋母情结和后恋母情结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记号和符号是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才使得符号体系成了某种动态的东西,相应地意义也成了一个表意过程。

克里丝蒂娃用其关于“女性伦理”的理论对现代世界中的母性作出新解释。在她看来,对母亲而言,虽然怀孕使女人备受主体分裂的痛苦,但孩子的出生却使母亲获得了一种新的爱的体验——“在这种爱中她慢慢地、艰难地万分愉快地学会了关心他人、温柔备至和忘掉自我”。依克里丝蒂娃之见,惟有“无辜的母性(guiltless maternity)”才能使女人在既不变成受虐狂又不失去其人格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这大概是“女性伦理”的主要内容。

克里丝蒂娃进而认为这种类似的伦理问题还存在于我们同自己及我们同他人的关系中。她认为,如果主体自身包含他人,那么主体对他人的爱或宽容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这也许正是克里丝蒂娃所说的“女性伦理”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也正是这一点,克里丝蒂娃宣称,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女二元结构以及西方文化中的所有类似的二元结构都已经过

时了,而女性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其“主体”是所有在社会中处于边缘或被边缘化的人,是所有被当作“外国人”、“陌生人”和“持异见者”看待的人。不过,像希克苏斯和伊里格芮一样,克里丝蒂娃主要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运动,进而把文化革命还原到语言或文学的层次上来。在她看来,语言的多元性直接就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因为主体无非是语言的主体。可见,克里丝蒂娃的符号分析学和女性伦理说都遵循同样的逻辑:不同的语言形式(记号与符号、诗语言和科学语言)和不同的主体(母亲和孩子、自我与他人)是互相关联或共存共生的。这种逻辑正是我们熟悉的法国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逻辑。

三、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走向及其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启示

毫无疑问,法国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为当代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和视角,但也遭受其他女性主义的非议和问责。传统女性主义是以探寻两性不平等、追求女性解放、男女平等为旨意的,有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而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以消解男性主体、倡导女性话语为理论旨趣的纯理论色彩追求,在一些女性主义眼中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本身存在的合理依据。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在其《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性别怀疑主义》中就曾质问道: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于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女性主义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那我们还谈什么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因此,有人说,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8]许多女性主义者拒绝与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为伍,而一些观点中允的人则认为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9]更吊诡的是,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反对宏大叙述,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地构造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极其成问题的宏大叙述和准玄学话语。

法国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如果没有重大的结构变革或技术突破,21世纪的发展趋势基本上将会是目前发展趋势的延伸和调整。那么,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

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 and 理论思潮,势必会继续在观念和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影响和启示,而这两者的继续碰撞和激荡也势必会擦出新的火花。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观压缩在同一空间,情况相当复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上,既有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处于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地区,也有中部一些经济发展一般的处于“现代”社会的地区,还有中西部广大处于贫困线以下所谓“传统”社会的地区,我们要具体分析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客观看待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促进中国女性全面发展,使女性成为中国社会各行各业中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3): 175-185.
- [2] 何雪松.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十大发展趋势[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81.
- [3] 吴小英. 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 2000(2): 44.
- [4] 夏光.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9.
- [5] Elizabeth. Grosz.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48.
- [6] 岳凤梅. 拉克与法国女性主义[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3): 59-63.
- [7] 李霞.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融合[J]. 国外社会科学, 1998(1): 16-17.
- [8] Nancy Freizer. Foucault on power, A Theory for? [M]//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1990.
- [9] 杨莉馨. 试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走向[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4): 104-105.

注释:

- ①“它在”是一个在西方、尤其是法国思想界中十分流行的术语,它的基本意思是不同于自己的他人或不同于主体的客体,含有不能与自我或主体等量齐观的存在,是异类、边缘的存在之意。又译为“异在”。

【责任编辑:夏畅兰】